



# 廖沫沙

## 全集

同志为我作腰带，一缝便有了革命  
字，身候当不<sub>于</sub>增加十倍也。  
我有此想也，这便稀奇，既不是  
军了改造着你，又不是民间招兵，  
或<sub>于</sub>成<sub>于</sub>将<sub>于</sub>，  
信<sub>于</sub>通<sub>于</sub>一些战争史料，  
便<sub>于</sub>得<sub>于</sub>一些研究机因，  
作为参考及资料而不予出版。但半  
为保你而未取而去，实出意外；现在又  
到深爱厚用志慰安，吾以吾添  
色，别又出意外，追源原故，立都不  
能<sub>于</sub>你们。我和我的老领导不真良  
写，但你们却是实足的伯乐了！  
真希望你们！

三家村文库

第一卷

非常感谢你，把我到阳朔岸  
同志为我作腰带，一缝便有了革命  
字，身候当不<sub>于</sub>增加十倍也。  
我有此想也，这便稀奇，既不是  
军了改造着你，又不是民间招兵，  
或<sub>于</sub>成<sub>于</sub>将<sub>于</sub>，  
信<sub>于</sub>通<sub>于</sub>一些战争史料，  
便<sub>于</sub>得<sub>于</sub>一些研究机因，  
作为参考及资料而不予出版。但半  
为保你而未取而去，实出意外；现在又  
到深爱厚用志慰安，吾以吾添  
色，别又出意外，追源原故，立都不  
能<sub>于</sub>你们。我和我的老领导不真良  
写，但你们却是实足的伯乐了！  
真希望你们！

三家村文库

敗筆，一經你有真贊

# 廖沫沙全集

第一卷

花城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廖沫沙全集 (第一卷) /花城出版社编 ·—  
广州：花城出版社，1997.11  
(三家村文库)  
ISBN 7—5360—2472—X

I. 廖…  
II. 花…  
III. 现代文学—中国—全集  
IV. I 21

## 廖沫沙全集

### 第一卷

\*

花 城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广 东 省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广 东 惠 阳 印 刷 厂 印 刷  
(广东惠州市南坛西路 17 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7 印张 8 插页 400,000 字

1997 年 11 月第 1 版 199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册

ISBN 7—5360—2472—X

I · 2130 定价：32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廖沫沙 1990年10月于北京家中

廖沫沙  
1939年在桂林



廖沫沙  
1946年在香港



廖沫沙与夫人陈海云  
1948年在香港家中



廖沫沙  
1965年在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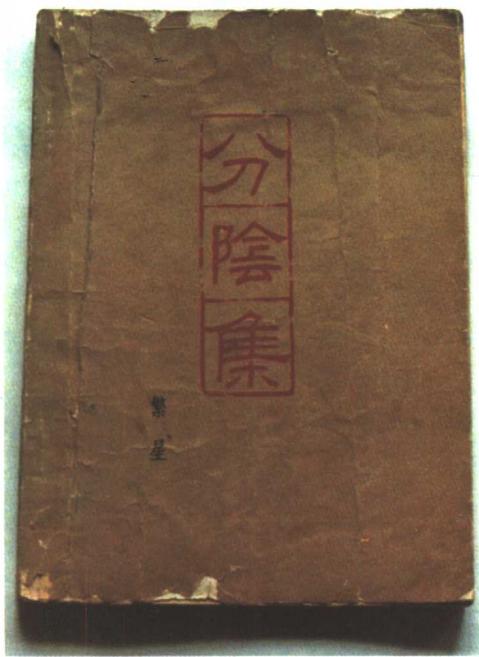


廖沫沙与夫人陈海云  
1949年在北京东交民巷北京市委机关旧址院中



廖沫沙与邓拓(左三)、李琪  
(左一)合影

1961年10月于北京平谷县  
海子水库



1962年《分阴集》初版封面



廖沫沙画像

1981年10月著名画家刘宇一画

廖沫沙与夫人陈海云

1950年于北京市委机关旧址



嘲吳晗并自嘲

嘲吳晗并自嘲

書生自喜捉文網  
為士乃今憂布網  
漏網猶負臂戴頭  
陽年歲闊風雲薄

一九六七年作

唐君毅

## 出版说明

对于七十年代以后出生的大多数人来说，“三家村”已显得陌生和朦胧了。但于一九六六年爆发的震天撼地、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从打倒所谓“三家村”揭开序幕的。

从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四年，邓拓、吴晗、廖沫沙在《北京晚报》、《前线》杂志陆陆续续发表了一批杂文，即《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文革”开始，这些文章就被诬构成“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的反党事件”，三位作者被诬以“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而横遭迫害。邓拓含冤自杀；吴晗一家老少四口，夫妻惨死，女儿由疯而亡，只剩下一个孤零零的孩子，无处栖身；唯一幸存的廖沫沙长期丧失自由，身心备受折磨。一时间，从北京市到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干部群众被打成“三家村黑帮分子”、“马前卒”、“小三家村”、“黑店伙计”等等，蒙受冤狱，其中不少人家破人亡，祸及亲友。

一九七九年，这一大冤案得以平反昭雪。为了牢牢记住惨痛的历史教训，避免类似的悲剧重演，我们特编辑出版邓拓、吴晗、廖沫沙的全集，以“三家村”文库的形式刊行，为历史留下一份真实的原材料。

---

## 《廖沫沙全集》序

郑天翔

廖沫沙同志是一位真正的共产党员。他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生。他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著作。《廖沫沙全集》把现在能够收集到的沫沙同志的著作大都集中起来了。通过这个文集，人们可以看到廖沫沙同志是怎样经过曲折崎岖的道路，顶着急风暴雨，始终如一地为革命事业奋斗，对中国人民始终如一的忠诚。

廖沫沙同志是一九三〇年入党的老党员，是一位杰出的革命文化战士，是一位著名的杂文作家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卫士。从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三六年间，在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上海，他三次被捕。面对白色恐怖，他坚贞不屈，出狱后马上找党组织，继续战斗。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偕同战友，奔赴武汉，立即投入抗日斗争。他的武器是笔，他主要是用笔进行战斗。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死敌。沫沙同志入党的次年就是“九·一八”事变，国民党反动政府不抵抗，东北三省迅速沦亡。翌年，淞沪抗战，日本帝国主义疯狂地进逼，蒋介石不仅不抵抗，还破坏爱国部队的英勇抗战。这使廖沫沙和他的同志们和广大人民无比愤慨。他们看到：不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革命，中国人民的

解放，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都无从谈起。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独立，中国人民解放的最宏伟、最具有决定意义的斗争。廖沫沙立即用他犀利的笔投入这场斗争。他到湖南办报、到桂林办报、到重庆办报、又到香港办报，他又当编辑，又要写稿，写社论，写时评，短评，写政治评论，写军事评论，还要写文艺评论，以及副刊所需要的各类文章，如他自己所说“是无所不谈，无所不论”。所有办报都是根据党的指示，党需要他到哪里办报，他就到那里办报；所有的谈论都是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他热情讴歌抗日战场上英勇顽强、杀敌立功的英雄，批判和揭露躲在后头，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国民党顽固派，宣传群众，教育群众，组织群众。怎样对抗日、对党、对人民有利，他就怎样谈论。为了坚守战斗岗位，沫沙同志遭受了人世间最为惨痛的痛苦。然而，他挺过来了，岿然屹立于他的战斗岗位。他对民族解放和革命事业的忠诚使他达到一个忘我的境界。面对着白色恐怖，面对着飘忽不定、物质贫匮的生活，面对着日寇的狂轰滥炸，沫沙同志置个人安危和生死于度外，始终如一。在他身上体现着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的崇高的品格和道德情操。

沫沙同志温文尔雅，但是，真如人们所说，柔中有刚。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同“三家村”的两位“村友”邓拓、吴晗首遭劫难。邓拓含冤玉碎，吴晗被批得体无完肤，死去活来，后来被折磨身亡。沫沙同志本人则是头破血流。在一次批斗会上，他看见吴晗，还互相取乐，并以诗相嘲。他《嘲吴晗并自嘲》诗曰：“书生自喜投文网，高士如今爱折腰。扭臂栽头喷气舞，满场争看斗风骚。”自居高士，自唱“不畏严寒与酷暑”。他在囚禁之中，还有那么一种闲情，把桔子皮捏成花朵以自娱。而对于气势汹汹的审讯人员，则娓娓而谈，语带幽默，表达了对那种“胡来”的蔑视。他毫不在乎地对那些动辄以死吓人的人说，“我已经罪恶滔天，再多添一些，也滔不到天外去”。“死，吓不倒我”。斗罢归来，他

又作起诗来，说“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拜年”。看一看这样的诗，看一看他在“瓮”中的创作，人们可以感觉到这位忠诚于自己理想的革命战士的骨头是多么硬！

沫沙同志的骨头这么硬，那是因为他通过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中国优秀文化遗产，通过革命的艰苦斗争和磨难，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懂得了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客观规律，他的世界观得到根本改造，他的人格就会发生飞跃，他的言论，行动，做人处世，就会达到一个新的境界，达到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最高利益，个人利益服从于党和人民的利益的境界，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可以牺牲自己的利益以至生命的境界，体现了人类历史上最高尚的道德，最纯洁的情操，最灿烂的精神文明。

《廖沫沙全集》像所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老革命家的著作那样，留给下个世纪，供后人学习和研究。

二十世纪是中国从黑暗走向光明的世纪。出现了前仆后继的伟大的民族解放运动，伟大的人民革命战争；出现了伟大的革命家、战略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中国人民创造了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都望尘莫及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二十一世纪要向二十世纪学习。中华民族的解放，中国人民的翻身，就是从学习前人中得来的。前人的理论和实践、失败和成功，是最伟大、最具有创造力的大学校。后代人一定要超过前人，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必定要在学习前人中超越前人。我们的后代承担着把共产主义理想坚持下去，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坚持下去的责任。他们会取得成功，同时，会遇到困难和曲折。他们前进的方向是明确的，但也可能出现某些阴影，某些迷惘，某些彷徨和某些失误。他们的前人是怎样在黑暗中摸索到光明，怎样在曲折的道路中寻找到坦途，怎样在汹涌的波涛中把握正确航

向，一句话，怎样从失败走向胜利的？研究前人走过的路，是取得成功的最重要的途径。自上世纪中叶以来，中国人民走过的路是非常曲折的。但经过无数牺牲和千难万苦，终于找到了正确的道路。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它反反复复教给中国人民：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救中国，才能发展中国。这是一个重复了多少次的论断。越往后，越来越多的人会越加深切地认识到这个论断的正确性和迫切性。

我们就要进入二十一世纪了。现在的青年人在下个世纪要担当起前人交给他们的历史重任。他们首先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装起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必须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老一代革命家给我们留下来的丰富的精神遗产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最好的继承者和发扬光大者。现在，老一代革命家的文集、选集、传记、回忆录已经出版了一大批。还要继续出版。它们不仅生动地叙述了我国革命的历史，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历史，我国人民翻身得解放的历史，还形象地描述了老革命家的风采。这些，是二十世纪留给二十一世纪的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人们可以从这里学习怎样革命和怎样做人，可以从这里得到战胜困难的智慧和力量。

《廖沫沙全集》展示了一个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青年怎样刻苦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和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怎样做人处事的历程。谨此为序。

一九九六年九月三十日

---

## 执著的追求 坦荡的胸怀

### ——忆廖沫沙同志

张友渔

“三家村”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大历史冤案，曾经轰动海内外。经过“十年浩劫”，廖沫沙同志是“三家村”唯一的幸存者。

沫沙同志一九三〇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半个多世纪，在党的新闻、思想、文化战线上，风风雨雨，奋斗了一生，是一位敢于为真理而献身的优秀的共产主义文化战士。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传来他溘逝的消息，我很吃惊。当年的十月八日和十二月十一日，原《华商报》和《新华日报》在京的同志，先后两次聚会，为我们八十以上的老人祝寿。他是老人之一，曾兴致勃勃地讲了话。据他的亲属讲，他去世的当天中午，还与友人小酌，谈笑风生。下午，他觉得身体不适，当医生前来抢救时，他已坐在沙发上，坦然而无遗憾地长眠了。他去得匆忙，走得安详，以至于我们这些与他共事多年的老同志、老朋友未能在他临终前见上一面！每念及于此，沫沙同志的音容笑貌犹在眼前。缅怀他八十四年走过的道路，许多往事涌上心头。

沫沙同志一九〇七年一月，出生于湖南长沙县东乡的一个农民家庭。他的父亲曾当过兵，参加了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占

领北京的战斗。沫沙同志五岁进乡里的私塾读书，高小毕业后，考入长沙师范学校。当时正是“五·四”运动之后，革命热潮风起云涌。他受进步教师和学生的影响，开始阅读《向导》、《新青年》等书刊，并参加了学生运动。一九二七年，长沙发生了“马日事变”，大批革命者遭到屠杀。面对国民党的叛变和凶残，血气方刚的沫沙同志毅然加入到革命行列。在残酷的斗争中，他的革命意识开始觉醒，认识到要推翻黑暗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必须寻求真理，进行革命。他积极参加了进步学生举行的罢课和集会，名字被列入了国民党要捕杀的黑名单。为了寻求革命道路，他只身来到当时革命斗争轰轰烈烈的上海，不久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白色恐怖下，他一面在报纸当编辑，一面参加革命活动。他曾经三次被捕入狱，在敌人的威逼利诱面前，始终坚贞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气节。

当时的上海，左翼文化运动已经有了很大发展，一些进步的文艺刊物提出了“普罗列塔利亚文学”（即无产阶级文学）的主张。沫沙同志读了大量的革命理论和文学作品，思想上有了很大提高，并且开始从事文学创作活动。他非常崇敬鲁迅先生，立志学习鲁迅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战斗精神，潜心学习鲁迅的文章风格，像鲁迅那样以杂文作为利器，向黑暗社会和各种反动势力进行斗争，他不断地给《申报》副刊——《自由谈》和《中华日报》副刊——《动向》等报刊投稿，他的杂文显露出思想的敏锐和笔锋的犀利，在上海文坛，他与《论语》杂志主编林语堂就小品文的格调引起的争论，曾经轰动一时。沫沙同志当时只有二十多岁，对林语堂这位被称为大作家的人提出的遁世哲学，即在反动派高压面前采取“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写作态度，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论争。初出茅庐的沫沙同志，表现出无产阶级文化战士的锐气。重新翻阅他当时所写的杂文，可以看出立意的深刻，分析问题的透彻。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沫沙同志一直战斗在新闻战线，先后在长沙、沅陵、桂林、重庆、香港等地，任《抗战日报》、《救亡日报》、《新华日报》、《华商报》等报社的副主编、编辑主任、副总编辑、主笔等职，撰写了大量的论文、评论、杂文和小说，为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建国以后，沫沙同志从香港回到北京，在中共北京市委历任宣传部副部长、教育部长、统战部长等职。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不忘辛勤写作，怀着对党和人民的热爱，写下了不少讴歌社会主义新中国，匡正时弊，活跃思想，振奋精神，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和歪风邪气的杂文。这些杂文，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影响，对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思想和文化教育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是也给他自己带来了祸患。一九六一年，他为吴晗同志新编京剧《海瑞罢官》而写的《“史”和“戏”》、评孟超同志的《李慧娘》而作的《有鬼无害论》，本是两篇谈历史的真实性和从文学角度赞扬赋予鬼神形象以反抗精神的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文章，竟在五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成为“反党”罪证。同年，沫沙同志与当时的中共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同志和副市长吴晗同志，为市委的理论刊物《前线》编写的杂文专栏《三家村札记》，又惹出无端的大祸来。“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江青、康生和谢富治等人，首先以“三家村”发难，制造了一桩影响全国、骇人听闻的大冤案。邓拓和吴晗同志先后被迫害致死，沫沙同志被囚禁了八年，以后又被流放到江西林场，身心受到了严重的摧残。在恶劣的环境里，沫沙同志始终不渝地忠于党的事业，坚持真理，临危不惧，同林彪、江青、康生等人作坚决的斗争。他凭着丰富的人生阅历和革命斗争经验，度过了黑暗的岁月。大难未死，他终于看到了大地春回。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三家村”的冤案得到了平反昭雪，沫沙同志作为“三家村”的幸存者，也作为证明人，参